

中国 小说史 略 批判

欧阳健 / 著

经典毋庸置疑吗？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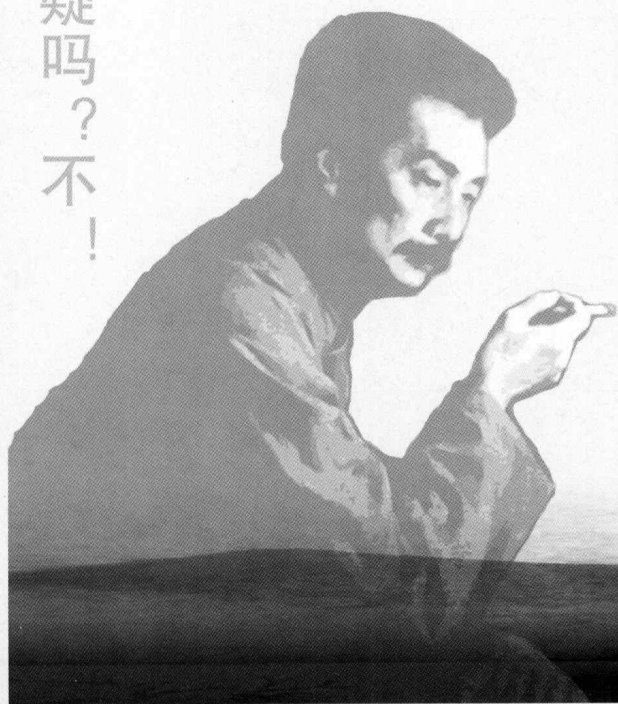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
小说史略
批判

欧阳健 / 著

经典毋庸置疑吗？不！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小说史略批判/欧阳健著.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7-203-05969-1

I. 中… II. 欧… III. 鲁迅著作—小说史—文学研究—中国 IV. I210. 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89932 号

中国小说史略批判

著 者: 欧阳健

责任编辑: 阎卫斌

装帧设计: 天路—水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220 (发行中心)

0351-4922208 (综合办)

E-mail: fxzx@sxskcb.com

web@sxskcb.com

Renmshb@sxskcb.com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 晋中万嘉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3. 25

字 数: 234 千字

印 数: 1—6000 册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3-05969-1

定 价: 26.00 元



2006年2月28日于南京（这是
亡妻为我拍摄的最后一张照片，此
后她就再也无力举起相机了）



2007年5月6日于福州

侯忠义

鲁迅写于1923年的《中国小说史略》，是中国小说史的奠基之作，是第一部系统完整地研究中国小说的通史。它勾勒了古代小说的基本面貌，构建了古代小说的学术体系，在资料搜集、作家考证、作品评价等方面，功力深厚，观点精辟，见解独到。它取得巨大的学术成就，几成小说研究者效法的典范和遵循的原则，影响了几代学人，至今仍起着教科书般的作用。

对《中国小说史略》的尊重甚至崇拜，也体现在我们自己的研究中。1975年，我参加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修订《中国小说史》（1978年出版）编写组，其书就仍依《中国小说史略》体例为基本框架和模式，主要观点也是依《中国小说史略》为准，只不过扩大了一点作品的范围、加强了阶级分析的方法而已。记得当时我曾提出点疑问：“为什么鲁迅说的就一定要照办呢？”当即就受到了批评，说：“那怎么行？一切都以鲁迅说的为准。”1991年，我个人出版了《中国文言小说史稿》，台湾魏子云先生读后，说我的书仍未脱《中国小说史略》架构，我亦坦然承认。《中国小说史略》在我们心中是神圣的。学好用好《中国小说史略》，是我们必须掌握的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基本功，在此基础上，才能求得进一步的提高和发展。这就是我主张青年教师首先要熟读甚至精读《中国小说史略》的原因。

《中国小说史略》成书于上个世纪初，至今已历八十余年。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获得了迅猛发展。新材料、新观念、新见解、新思路层出不穷，硕果累累。《三国》、《水浒》、《西游》、《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名著的研究，在前人成果基础上，又获得了新的进展；它如“三言”“二拍”、《醒世姻缘传》、“明末清初小说”、《歧路灯》等作品，也成为研究的热点。文言小说如《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

记》及明代传奇小说,都受到学者的高度重视。有关小说史的撰著,出现了通史、断代史、题材史、体裁史、艺术史、理论史、研究史,门类齐全,百花竞放。因此,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中国小说史略》作一认真的总结和平议,并进行补苴、匡正和开拓,或曰之为批判(批评、判断),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正常的,对于促进今后古代小说的研究,是十分有益的。鲁迅先生亦曾自言,他常根据新材料与新成果,对《中国小说史略》“时有更定”、“增修”,这是再正常不过之事。

2004年春,好友欧阳健赴太原为山西大学文学院研究生讲课,我建议他开设《中国小说史略》疏讲,以为对古代小说研究生十分必要。2005年11月,与欧阳健兄在南京“海峡两岸明清小说研讨会”相遇,谈起教学《中国小说史略》的体会,我力促他把平议《中国小说史略》的工作完成。这是一个多角度多层次的全面研究工作,涉及《中国小说史略》的版本辨伪、考证,及观念、体例、评价诸多问题,难度是很大的。作为教学,主要是疏讲《中国小说史略》,同时介绍学界的新成就和新观点,并适当表达自己的见解。《中国小说史略》的历史地位和所达到的成就,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岁月仍然不能掩盖它的光彩,至今仍是文科学生、教师的基本读物和经典著作。我想,这也是本书写作的基本思路。但教学中的疏讲与写成的著作是不相同的,它们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现在抽出《中国小说史略》的具体讲解,以平议匡正《中国小说史略》的得失为主,这应该是本书的显著特点。

欧阳健先生曾主编《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写有《晚清小说史》、《中国神怪小说通史》与《历史小说史》。而今虽过耳顺之年,精力尚称充沛,以两年时间完成本书,进展还是很快的。这本著作是他多年研治古代小说的心得,也反映了他的部分学术见解,从文献、观念、体例、评鹭四个方面评判《中国小说史略》,确实道出了一些前人没有说过的东西。历史在前进,学术在进步,研究批判《中国小说史略》,正是古代小说研究发展和进步的体现。因此,我很高兴为本书作序,写了以上的话。

2007年春节,于北京大学

自序

启蒙时期的教科书,对一个人的影响几乎是终身的。因得教科书的哺育和熏陶,并构成日后学习工作的基点,书上的知识遂被视为真理,人皆甘心从之而不违。《中国小说史略》(以下或简称《史略》)就是这样一部启蒙教科书。它既是二十世纪开启“小说学”新纪元的奠基之作,又是中文系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必读教材,对《中国小说史略》怀有尊崇膜拜的心理,是极其自然的。

追溯起来,《中国小说史略》也确是一部教科书。鲁迅在《柳无忌来信按语》中说,“我的《中国小说史略》,是先因为要教书糊口,这才陆续编成的。”假如没有“教书”这一职业,或学校不设“小说史”课程,情况也许就完全不一样了。由于是自编的讲义,自然要考虑讲课听课之便,与一般学术著述是不大相同的。从后人回忆的材料看,讲课的效果可说是相当的好。冯至说:“鲁迅一开始就向听众交代:‘《中国小说史略》已印制成书,你们可去看那本书,用不着我在这里讲了。’”(《鲁迅在北大讲课的情景》)徐霞村回忆道:“我去听过他的小说史略,讲得很生动!我记得有一次他讲唐人小说,张鹞的《游仙窟》。我们去听课都要先买到《中国小说史略》,他稍微念上那么一两段,不是照着书上讲,与书有关系,但是又发挥一些见解,这个见解又不走得太远,他教学教得真好!”(徐小玉《徐霞村访谈录》)作为教科书,《中国小说史略》经过认真经营,成了传世的专著。教材讲究的是条理,演讲追求的是效果,专著需要的是深入,鲁迅很好地处理了其间的关系,是值得称道的。

《中国小说史略》出版后,赢得了相当的声誉。1926年12月7日广州《民国日报》发表张迂庐《欢迎鲁迅先生来广州》,说他是“创中国文坛未有之新格的《呐喊》《彷徨》的著者,是著《阿Q正传》而被译成五六国文字且被法国现时大文豪罗曼·罗兰啧啧称道过的人,是空前

的《中国小说史略》的著者”——这是来自青年的赞赏；胡适 1928 年作《白话文学史》，自序说：“在小说的史料方面，我自己颇有一点点贡献，但最大的成绩自然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这是同为小说学“开山祖师”的胡适的肯定。而当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成为时代基调，《中国小说史略》权威教科书的地位，更是空前地确定了。它犹如高大的山峦，闪光的星辰，被奉为研治古代小说的经典和圭臬，影响了一个世纪的几代学人。因了《史略》的自身成就，加上逐渐形成的思维定式，使后世学人大有“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之感。然而，佩服到五体投地的极致，诚惶诚恐的眼光所看到的，就不但是神圣崇高，而且是不可企及。惟此之故，有人说：“《中国小说史略》对我读古典小说帮助最大，不仅指示门径，就连轻重缓急也多半遵循他的指示。后来读别种中国文学史，感觉较之此书差得实在太远了。我甚至想后来治文学史者无须自辟门路，单对这书详细加以笺疏，已经可以成为一部上乘之作了。”（止庵《读书之旅》）又有人说：“鲁迅做完一件事就像一个山峰竖立在那，后人不能超越。鲁迅写了中国第一部小说史《中国小说史略》，今天所有研究古典小说的人必须看它，看完之后只有佩服，因为确实超不过他。他对《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红楼梦》的评价，今人没有办法超越他。我研究通俗小说是从《三国演义》开始，从唐传奇开始一直下来的，读完鲁迅的东西我只觉得他说的是板上钉钉。”（孔庆东《正说鲁迅》）用作教科书的《中国小说史略》，经历了无数人无数次教学实践的检验。系统的教学让教者察觉了许多问题，也让他们思考了许多问题。讲着讲着，甚至也会感到讲不下去了，这自然给他们带来了许多苦恼；但在多数情况下，他们还是选择了以“学习体会”或“学术札记”的方式提出问题，在肯定的前提下进行委婉的商榷，但总让人感到没有说到点子上。一直吸吮着鲁迅乳汁的人们，虽然并不缺乏判断力与想象力，但囿于种种先验的和后天的框框，从来没有想过煌煌《史略》会有什么问题，更不会想到要去突破和超越了。这就使得诸多的小说史著作，莫不以《史略》的理论框架与具体断制为逻辑前提，驯致不但丧失了创新的品格，而且丧失了论者的自我，非怪有“在中国小说史研究领

域,至今仍处在‘鲁迅时代’”(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的感叹了。

我与《中国小说史略》也有三四十年的缘分。三十二年前,我还在业余时间从事研究,因察觉《水浒传》之“农民起义说”与原书有悖、又难以找到恰当表述方式时,“《三侠五义》为市井细民写心,乃似较有《水浒》馀韵,然也仅其外貌,而非精神”数语,顿时照亮我的心扉,遂撰写出《〈水浒〉“梁山泊聚义”性质辨》、《〈水浒〉“为市井细民写心”说》等,论证《水浒》写的不是农民起义,“为市井细民写心”才是《水浒传》的本质特征。可以说,是《史略》将我引进了古代小说研究之门。然而,不久有人撰文反驳道,鲁迅只说过“《三侠五义》为市井细民写心”,并没说过“《水浒》为市井细民写心”,我的说法分明是对《史略》的歪曲和篡改。我不得不站出来辩解道,既然鲁迅说“《三侠五义》为市井细民写心,乃似较有《水浒》馀韵”,则《水浒》的“精神”,无疑更是“为市井细民写心”了。辩来辩去,都是在逻辑上兜圈子,让人感到乏味和无奈。时过境迁之后,我忽然悟到:《史略》之于《水浒》的思想艺术,几乎不曾沾着一字;“为市井细民写心”的认知,实际上是我通过《水浒》文本的解读得来的:拳打镇关西、卖刀杀牛二、怒杀阎婆惜、枷打白秀英、斗杀西门庆等,大都发生在城镇;无论是令人痛恨的“破落户”,还是抱打不平的英雄,都寄托了市民强烈的憎和爱,等等。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抬出鲁迅以为护法呢?这不是太没出息太没志气了么?

二十二年前,我已经成为专业研究者,因主持编纂《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注意到一组以往无人留意的数字:自唐代至清末的白话小说现存1164部,1901年至1911年竟有529部,十一年的作品几乎占了一千二百年总量的一半。这一事实迫使我苦苦思索:是什么激发了晚清小说家的创作热情?看《中国小说史略》的说法是:“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亦屡挫于外敌,细民暗昧,尚啜茗听平逆武功,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气,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我想,庚子岁后“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为什么还有人写小说“呼维新与爱国”(“维新”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呢?检阅《光绪朝东华录》等史料,我发现庚子国变以后,中国恰已进入“有识者翻然思改革”的新阶段。我在1996年写成的《晚清小说史》指出:在晚清近五百部小说中,认真研究过的只是“四大谴责

小说”，写成单篇论文的不超过二十部，大量晚清小说未进入研究领域，其症结就在鲁迅的“谴责小说”论和胡适的“没有结构”论，这两大思维定式导致了贬低晚清小说的倾向：“鲁迅和胡适本身就是近代史中的人物（胡适在1904年还写过一部小说《真如岛》），他们在近距离评论晚清小说，无疑有其特殊的长处；但正因为过于贴近，也难免有失当之处。由于他们的崇高地位，他们对于晚清小说的见解，尤其是‘谴责小说’说和‘没有结构’说，造成了对晚清小说贬大于褒的思维定式。因为踏进了这一误区，后人的研究几乎莫不以之为前提和出发点；人们即或发觉其间之不妥，也只能做一点回护补救的工作而已。这种思维定式，妨碍着人们发现和开拓的眼光，是晚清小说研究难有突破在方法论上的根本原因。”

十二年前，我从江苏省社会科学院调到大学，除了教学中常引《中国小说史略》的论断和材料，还两次以它为教材系统地讲解过。一次是2000年在福建师范大学，听课的有六位研究生。我提出，学《史略》应从“熟悉它所揭示的资料”和“领悟它所得出的论断”入手。每一节课，先由一位学生逐句疏解，扫清障碍，明其要义，发表心得，提出质疑，然后开展讨论，气氛相当活跃。《史略》二十八篇，足足研读了一个学期。结束时，布置每人撰写一篇《〈中国小说史略〉反思》作为作业。邓美华的《用新的眼光审视〈中国小说史略〉》，经我修改后发表在《阴山学刊》2001年第1期。发表时，为编辑删去的原文的小标题，可以窥见我当时的基本态度：

- 一、《中国小说史略》——小说史的创新之作；
- 二、《中国小说史略》的精髓历久弥新；
- 三、《中国小说史略》铸成的思维定式对创新的负面作用。

另一次是2005年在山西大学，讲题为《〈中国小说史略〉疏讲》，听讲的有二十位研究生，每周半天讲四篇，七周讲完。由于时间不够，未能带领学生逐章细读，只从总体上进行疏讲，并提出若干问题供大家讨论。我鼓励学生在明其要义的基础上更新观念，树立怀疑和反思的勇气，在人家以为“没有问题”的地方发现问题，在人家以为“问题很多”的地方看出其实并无问题。要有“后来居上”的勇气和眼光。“居上”典出《史记·汲郑列传》，原是针对新进反居老成之上的贬词。但为学确如积薪，后来者站得高，看得远，能纵观大势，俯览全局。当然，后

来者更要“求真务实”。求什么真？求事物真相之真，求学理真知之真；务什么实？务文献考索之实，务文本解读之实。由于准备比较充分，讨论比较活跃，讲课效果尚称可人，遂引发了我在讲稿基础上撰写《〈中国小说史略〉批判》的意念。

应该承认，这个书名是效法李长之的《鲁迅批判》的。我赞赏他不因鲁迅是巨匠而虚美，也不因热爱鲁迅而饰非，本着求真的目的，是其是，非其非；更赞赏他“要同情的了解，无忌惮的指责，可以有情感而不能有意气，可以有风趣而不必尖酸刻毒，根据要从学识中来，然而文字仍需是优美而有力的创作”的意见，与“批评精神的核心是在争一个真是非，是在不徇私（阿其所好和肆意攻击都是徇私）”的原则（姜德明：《李长之的书评》，《今晚报》2000年11月23日），愿以之悬为本书的宗旨和准则。“批判”一词，本意乃指在案牍上批示判断，如《太平广记》卷三〇八引谷神子《博异志·李序》，谓“元和四年，寿州霍丘县有李六郎，自称神人御史大夫李序，与人言，不见其形，有王筠者，为之役。至霍丘月余，赁宅住，更无余物，唯几案绳床而已。有人请事者，皆投状。王筠铺于案侧，文字温润，须臾满纸。……邻近数州人，皆请休咎于李序，其批判处犹存。”又如王铎《默记》卷中，谓“晏知止作府推，时诸子房中案牍犹多，祖宗自批判者文字甚众”。“批判”又指对某个公案的评论，如《五灯会元》卷二十谓“留守陈丞相俊卿会诸山茶话次，举‘有句无句，如藤倚树’公案，令诸山批判。皆以奇语取奉。师最后曰：‘张打油，李打油，不打浑身只打头。’”又如《朱子语类》卷一：“而今说天有个人在那里批判罪恶，固不可；说道全无主之者，又不可。”一句话，可概括为“批改错漏，品定高下”。至于带贬意的对错误观念的批驳，则是后起的意思。

我的基本态度是：《中国小说史略》是经典性的学术“杰构”，它作为“小说学”的教科书，将会长时期使用下去，其历史造成的权威地位是不可抹杀的。但也要看到，随着教学目标和教学方式的变化，教科书的地位和功能都发生了变化，它已不再是单一的知识承载物，不再是教学的凭依，而是教学的资源。教师可以而且应该进行改编和重组，根据学生的兴趣和程度设计教学情境，为教学留下广阔的空间。在这种情势下，正视《中国小说史略》的局限与负面影响，是符合鲁迅的意愿的，也是教学改革形势所需要的。鲁迅1924年3月所写后记中，就说

过有关《水浒后传》作者的新材料，“惜得见在后，不及增修”；又说过“近时作者如魏子安、韩子云辈之名，亦缘他事相牵，未遑博访”，从不讳言因客观条件限制，资料搜集不全，时有阙失与未备的缺憾。1930年11月所写题记中，又谦称此书为“陈言”、“瓦釜”，希望后来者能写出“杰构”来。因此，不应把《史略》的论述当作预定的“前提”，当作不需证明的“公理”和“标准答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树立《史略》不是圣经，不是金科玉律，不是句句是真理，更不是一句顶一万句的意念，对培养学生的阅世能力和分析能力，推动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都是大有好处的。

由“《中国小说史略》疏讲”到“《中国小说史略》批判”，是一个质的变化。疏讲时说的有关《史略》的“是”，大多是被人反复说过的，因了篇幅的限制，锦上添花的话只好省略；而有关《史略》的“非”，说的人实在太少了，早过耳顺之年的我，通过三十多年的实践既已察知，学术良知不能让我缄口不言。批判的本意是公平论断，平议其是非短长，以为借鉴。《中国小说史略》是纯正的学术著述，站在学术评估体系的正常轨道，着眼于文学史家的鲁迅，就事论事，是本书的宗旨之一。“批判”这个论题，亦非欲显比鲁迅高明，只是因为生逢其时，有更多时间专注于小说研究，能看到许多新旧材料，想到一些鲁迅未及思考的问题而已。才薄识浅，谬论定多，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教正；倘能指证拙见之不能成立，来一个“否定之否定”，对于小说的研究和教学来说，岂非一件好事么？

目录

序 侯忠义 1

自序 1

第一章 文献篇 1

第一节 材料考 4

第二节 作家考 16

第三节 版本考 29

第二章 观念篇 57

第一节 性质论 58

第二节 起源论 67

第三节 演进论 79

第三章 体例篇 93

第一节 分类辨 93

第二节 章节辨 130

第三节 文字辨 141

第四章 评鹭篇 155

第一节 论断析 156

第二节 抑扬析 168

第三节 举隅析 191

第1

章

文献篇

文献是学术的基础,“正讹辨伪,证本清源”为最要义。小说史料大量散佚,现存材料真伪难辨,作品归属与版本递嬗有待稽考,都是撰写《中国小说史略》(以下行文为简洁故,或称《史略》)面对的难题。鲁迅 1933 年 12 月 20 日致曹靖华信说:“至于史,则我以为可看(一)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二)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已出四本,未完),(三)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共三本),(四)王国维:《宋元词曲史》,(五)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但这些都不过可看材料,见解却都是不正确的。”且不说“见解”之正确与否,单是“可看材料”四字,足以显示他对《中国小说史略》材料把握与运用的自信。

鲁迅身处小说始受重视、且进入学术视野的时代,对于小说文献的搜集、整理、考索、研究,确有拓荒之功与垂范之德。人们一提起鲁迅的名字,相信他的研究肯定合乎校讎学、版本学原理,所下的结论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阿英的纪念文章说,《中国小说史略》不止是一部“史”,也是一部非常精确的“考证”著作,代表了其时多数人的观点;钟东《仰望作为学者的鲁迅先生》一文,“从鲁迅对于中国小说文献的整理,去仰望作为学者的鲁迅”(《粤海风》2006 年第 6 期),则代表了新世纪仰视论者的共识。

但也应该考虑另一些因素。如鲁迅意识到文献搜集不全、且时有阙失未备,却归于“时方困瘁,无力买书”(《〈小说旧闻钞〉再版序言》),就不一定是实情。据鲁迅博物馆公布的数字,鲁迅藏中文线装书 946 种,7704 册;中文平装书 866 种,1112 册;俄语、日语、德语、法语、英语等书 3167 册,数量不可谓不钜。查《鲁迅日记》1920 年至 1923 年所载“书账”,1920 年用钱 51.80 元,购小说书《剪灯新话及余话》,5.00 元;1921 年用钱 137.19 元,购小说书《宋人小说五种》、《宋人小说十五种》、《说苑》、《忠义水浒传》、《宣和遗事》、《宋人说部书四种》、《拾遗记》、《宋人说部二种》,16.06 元;1922 年日记已佚,故略;1923 年用钱 149.20 元,购小说书《五杂俎》、《麈余》、《世说逸》、《说苑》、《通俗忠义水浒传》、《标注训译水

传》、《耳食录》、《池上草堂笔记》、《情史》，10.50元。三年购小说书共31.56元，占总书款338.19元的9.33%，其余十九为拓片（有两汉至隋唐间造像、石阙、墓志、瓦当等），至今保存4217种，5900余张，存研究金文石刻手稿30余种，3700多页，1987年上海书画社出版《鲁迅辑校石刻手稿》三函十八册，收抄录校勘石刻790余种，总计手稿1700多页。鲁迅1935年5月14日致台静农信说：“收集画像事，拟暂作一结束，因年来精力体力，大不如前，且终日劳劳，亦无整理付印之望，所以拟姑置之。”鲁迅所藏小说没有善本孤本，若将精力资金用于小说版本，其所获当比郑振铎、阿英、胡士莹大得多。

鲁迅说：“我将编《中国小说史略》时所集的材料，印为《小说旧闻钞》，以省青年的检查之力，而成仿吾以无产阶级之名，指为‘有闲’。”（《〈三闲集〉序言》）事情正好相反，《史略》的阙失与未备，恰是由于鲁迅的“无闲”。文献的搜集与研究，不光需要智慧，尤其需要光阴。古代小说汗牛充栋，有关材料浩如烟海，小说文本的阅读与材料的考索，无不需投入大量的时间。那么，鲁迅有多少时间用于小说研究？不妨来算一笔时间账。我们就从他18岁时算起，止于《史略》上卷印成的1923年前：

1898年，18岁，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

1899年—1901年，19岁—21岁，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路矿学堂。

1902年，22岁，入日本东京弘文学院。

1903年，23岁，为《浙江潮》杂志撰文，译《月界旅行》。

1904年，24岁，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

1906年，26岁，在东京研究文艺。

1907年，27岁，为《河南》杂志撰文。

1908年，28岁，从章太炎学，与周作人译域外小说。

1909年，29岁，辑印《域外小说集》。6月归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化学教员。

1910年，30岁，任绍兴中学堂教员兼监学。

1911年，31岁，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写成第一篇小说《怀旧》。

1912年，32岁，1月1日，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部员；5月，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8月任教育部佥事。公余纂辑谢承《后汉书》。

1913年，33岁，公余校《嵇康集》。

1914年，34岁，公余研究佛经。

1915年，35岁，辑成《会稽郡故书杂集》，刻《百喻经》成，公余搜集并研究金石拓本。

1916年，36岁，搜集研究造象及墓志拓本。

1917年,37岁,仍搜集研究拓本。

1918年,38岁,《狂人日记》发表。仍搜罗研究拓本。

1919年,39岁,发表《随感录四》、《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仍搜罗研究拓本。

1920年,40岁,译成《一个青年的梦》、《工人绥惠略夫》,仍研究金石拓本。

1921年,41岁,又校《嵇康集》。

1922年,42岁,又校《嵇康集》,译成《桃色的云》。

鲁迅所学专业是水师、路矿、医学,在中学堂教的是生理学、化学,都与小说无关。业余时间,“看短篇小说却不少,……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也曾热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N.Gogol)和波兰的显克微支(H.Sienkiewicz)。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回国以后,就办学校,再没有看小说的工夫了,这样的有五六年”(《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也许是工作的相对轻松,1909年—1911年搜集小说材料最见成效。1912年任政府官员,直到撰写《中国小说史略》的当下。《鲁迅日记》中除“休假”、“无事”,一般都得到教育部去上班,公馀时间又多用于翻译、创作,还得以《新青年》等等撰稿。他对于古籍的兴趣,又偏于纂辑史书、搜集拓本、研究佛经,再加上探亲、结婚、访友、购书、听唱、看病及种种政治的人事的纠纷,还能有多少时间从事小说考证和文本阅读?他在《随便翻翻》中说:“现在有一些老实人,和我闲谈之后,常说我书是看得很多的,略谈一下,我也的确好像书看得很多,殊不知就为了常常随手翻翻的缘故,却并没有本本细看。”其中就有宋人笔记里的“食菜事魔”和明人笔记里的“十彪五虎”。“随便翻翻”之所得,用于杂文犹可,用于学术研究,就显然不够了。

1920年8月鲁迅兼任北京大学国文系讲师,为准备小说史讲义,投入的精力有多少呢?《鲁迅日记》没有有关备课的记载。据日记,1921年2月14日,钱玄同送来《汉宋奇书》;2月16日,“其中堂”寄来《忠义水浒传》前十回;2月21日,钱玄同代买《宣和遗事》;2月22日,蟬隐庐寄来《拾遗记》;28日,假得《青琐高议》残本,等等。这些版本,多非秘本珍本,在鲁迅尚是头一次见到;而2月份的教学安排是:2日往师校讲,16日往高等师范学校讲,18日往大学讲,23日往高师校讲。上述材料是否吸收到讲课之中,就是大可怀疑的;况且早在1月21日,已“寄高等师范学校讲义稿”,2月21日,“寄大学讲稿”,无疑是不及吸纳新材料了。因为忙,鲁迅往往来不及注意小说研究动向。1924年3月后记道:“右《中国小说史略》二十八篇,其第一至第十五篇自去年十月中印讫。已而于朱彝尊《明